

# 中国流动人口变迁及政策启示

郑真真

**【摘要】**文章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与此前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结构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以往的特点,又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更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留,并且其性别结构更趋于平衡,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非农就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明显上升。从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年龄模式看,男女几乎同时加入流动行列。“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在城镇化进程中,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应当考虑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及新特点。

**【关键词】**流动人口 年龄结构 性别结构 受教育程度 年龄别流动模式

**【作者】**郑真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一、引言

中国拥有全世界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且从2000年的1.4亿增长到2010年的2.2亿,几乎占总人口的1/6。段成荣等(2008)利用1982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人口流动状况,将流动人口变动总结为九大趋势:流动人口的普遍化、流动原因的经济化、流动时间的长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的成年化、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和学业构成的“知识化”。20世纪80年代以婚迁、随迁和投亲靠友为主的流动人口中女性占多数,90年代则转变为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流动,主要构成是青壮年男性。女性外出务工人员的规模在90年代后期迅速增长,2000年女性流动人口中有48.9%因“务工经商”而迁移流动,更多已婚女性加入流动人口行列。随着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进入劳动年龄,更多农村青年加入打工者的行列。不少调查研究发现,他们与此前的农民工具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行为,如2010年国家统计局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发现,1980年以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已经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他们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部分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等(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2011)。此外,不同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就业形势的变化,以及作为主要流入地的大中型城市就业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变化,都有可能改变流动人口的迁移、就业和居留模式。

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流出地和流入地的人口结构,也会引起流动人口相关

经济社会行为方面的变化,在就业、婚育、居留决策等方面与此前流动人口有所不同,从而直接影响到城镇化和农村发展,尤其对城市中针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政策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了解流动人口状况及近年来的变化,分析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现有的相关公共政策亦应根据这些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本文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自 2000 年和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及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这些数据提供了调查前 5 年间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另一个数据来源是 2010 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以下简称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本文将根据上述数据,揭示流动人口结构在 2000~2010 年间的变化和流动人口中不同队列之间的差距,分析产生变化的原因,并讨论这些变化对未来城镇化进程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影响。

## 二、2010 年流动人口概况

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的户口登记地不在常住乡镇街道的人口总数为 260 937 942 人,在这些人当中,户口登记地在省内的属于市区内人户分离者有 39 906 796 人,由于这类人可能没有发生跨越区县的实质性迁移流动,本研究没有将他们计入流动人口(以下分析均未包括市区内人户分离者)。根据普查结果估计,2005~2010 年间的流动人口有 22 103 万人,女性占 46.8%。在流动人口中户口登记地为省内的有 13 515 万人;户口登记地在省外的约 8 588 万人。无论是流动人口总数、省内流动还是跨省流动的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在“六普”统计的流动人口中,约有 63.0% 来自农村;不过,省内流动者来自农村的比例略多于一半(54.0%),跨省流动者中有 81.6% 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女性占 48.8%;跨省流动人口中女性占 43.7%。

流动人口高度集中在 20~24 岁(见图 1)。初步分析发现,这种现象主要受总人口年龄结构和最近几年外出年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首先,2010 年的总人口年龄结构中 20~24 岁人口规模显著大于前后相邻的年龄组,其占总人口比例比相邻年龄组高出近 2 个百分点(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10~14 岁组比相邻两个年龄组的男女各多出 1 000 多万人),因而相应年龄的新增人口规模相对较大。其次,近年来有更多青年人完成义务教育,甚至完成高中或职高学业后才外出打工,因而年轻组外出规模显著缩小;同时由于外出年龄推迟,在 20~24 岁形成堆积。下文显示流动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显著上升,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因在校时间延长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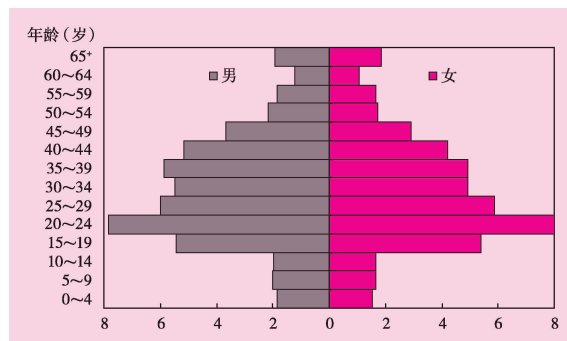


图 1 2010 年分性别流动人口年龄结构  
(占总流动人口百分比)

推迟外出就业的现象。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也占不小的比例,尤其是省内流动女性有 39.8%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见表 1)。作为比较,表 1 还列出了 2010 年普查结果中 20~24 岁总人口的教育构成,尽管这个年龄组人群的教育程度仍然是初中所占比例最高,但大专及以上学历已占 1/4,尤其是女性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程度的比例已稍高于男性,显示出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性别差距的缩小。虽然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略低于男性,但是差距并不大,男性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上的相对优势已逐渐消失。相对而言,跨省流动者有更高比例为初中程度,而高中以上的受教育程度者比例较低。结合下文的就业特征,可推断跨省流动者多在制造业工作,而省内流动者有相对较高比例从事技术工作,不同的劳动市场需求和就业结构形成了这种差距。从就业机会而言,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可能在省内有更多选择、可以相对容易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因而不必远距离跨省流动。此外,由于省内更有高比例的城—城流动者,省内流动者和跨省流动者的受教育构成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城乡差距。

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发现,30 岁以下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女性中有 44.4%具有高中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该比例远高于 30~39 岁流动妇女的 21.0%和 40~49 岁流动妇女的

表 1 2010 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 %

受教育程度	省内		跨省		20~24 岁总人口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小学及以下	17.3	22.0	17.3	22.0	6.7	8.1
初中	39.1	38.3	39.1	38.3	46.1	47.0
高中	26.2	23.5	26.2	23.5	22.2	19.2
大专及以上学历	17.4	16.3	17.4	16.3	25.0	25.7

15.1%。这一现象反映了近年来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有显著提高,而且不少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加入到流动行列。还有调查发现,不少青年农民工的父辈是在外打工的农民,他们无论从受教育程

表 2 2010 年分性别流动人口的迁移原因 %

迁移原因	省内		跨省	
	男	女	男	女
经济原因	55.5	44.4	85.6	76.3
务工经商	22.8	25.9	67.0	69.7
工作调动	5.7	3.4	2.8	2.0
学习培训	14.5	15.2	4.3	4.6
非经济原因	44.5	55.6	14.4	23.7
婚姻嫁娶	2.1	9.9	0.7	5.0
随迁家属	14.0	19.2	7.7	11.4
拆迁搬家	14.1	12.8	0.8	1.0
投亲靠友	4.3	5.0	2.7	4.0
寄挂户口	1.1	0.9	0.1	0.1
其他	8.9	7.8	2.4	2.2

度还是受教育质量上都可能高于父辈,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农民工在就业上也许会有不同于上一代的表现。

从流动原因看,流动人口中因经济原因流动仍占大多数。跨省流动的流动原因以经济原因为主,省内流动中两种原因几乎各占一半,且存在明显的男女差别(见表 2)。由于省内流动人口中有相当比例的城—城流动者,其流动原因和个体特征与乡—城流动者有较大区别。

按年龄细分,不同迁移原因的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年龄性别特征,特别是 15~

19岁务工经商的流动者和因婚姻嫁娶而流动的妇女。图2显示了不同年龄不同原因流动的人占同龄流动人口的比例。女性在18岁以后因婚姻嫁娶而流动的比例逐渐上升,15~19岁因婚姻嫁娶流动的妇女约20万人;男女在20岁以下因务工经商流动的比例相差较小,在20岁以后差距明显拉大。

由于婚姻嫁娶的流动年龄别模式取决于初婚年龄的变化,其他非经济原因的流动亦无明确年龄别模式,本研究更为关注因务工经商发生流动的年龄别模式。图3给出了流动原因为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的分性别、年龄迁移率,显示了与劳动参与率颇为相似的模式。在十几至二十几岁的迁移率上升时期,男女的上升速度一致,但女性比男性提前两年达到峰值,即女性峰值在24岁,男性在26岁,随后都呈缓慢下降趋势。可见,无论男女,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相当一部分人退出了流动者的行列,不过相对而言,女性比男性平均早退出两年。

由于男女返乡的原因不同,退出迁移的年龄也呈不同模式。“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表明,流动妇女返乡的前三位原因是结婚、孩子上学需要照顾、生孩子和照料幼儿,分别占首要返乡原因的20.6%、18.2%和11.8%。由于孩子上学和照料幼儿的需求主要发生在妇女25~40岁阶段,并会持续数年,因此造成这个年龄段妇女比较集中地退出流动状态。相对而言,男性返乡的主要原因集中在没有赚到钱、不满足外面的工作、在家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分别占首要返乡原因的18.9%、14.1%和11.9%,这些情况有可能在任何年龄发生,而在年龄较大时更有可能出现。例如有调查显示,受2008年金融危机对沿海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冲击,那些年龄偏大、已有回乡打算的农民工平均提前3年返乡(贺雪峰等,2010)。不过,对于因务工经商流动的人而言,无论男女,绝大部分在60岁以前退出流动人口的行列。

由于流动的主要原因为务工经商,且流动人口绝大部分在劳动年龄,因此流动人口的就业率相当高。从分性别职业特征看,跨省流动男性更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而省内流动女性则有更高比例的商业服务业人员(见图4)。省内流动女性有更高比例为商业服务业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前者可能是由于各地商业服务业对本地劳动力有更大的吸纳能力,后者与省内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比例较高相呼应,显示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在省内流动的情况。至于是哪些人在从事哪些职业,从事这些职业时间的长短,则需要有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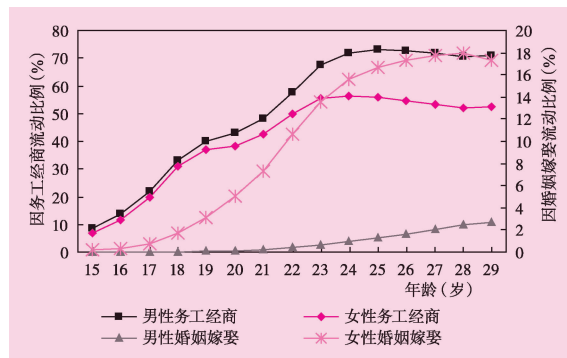


图2 务工经商和婚姻嫁娶流动者占同龄流动人口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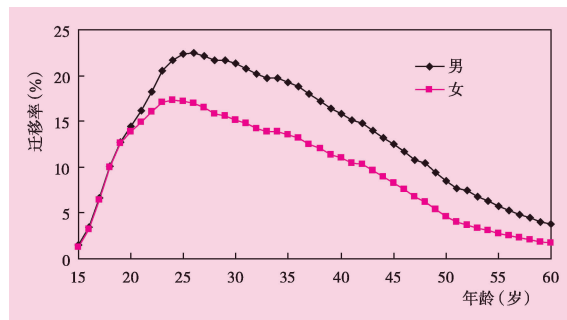


图3 2010年因务工经商流动的分年龄、性别迁移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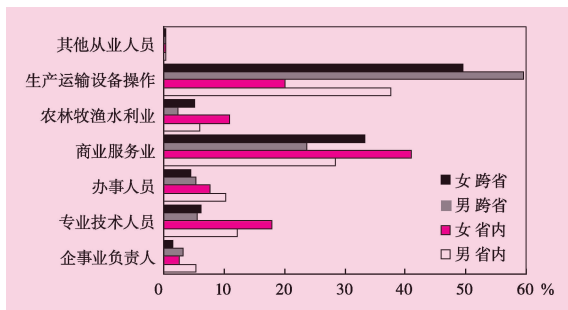


图4 2010年流动人口的分性别就业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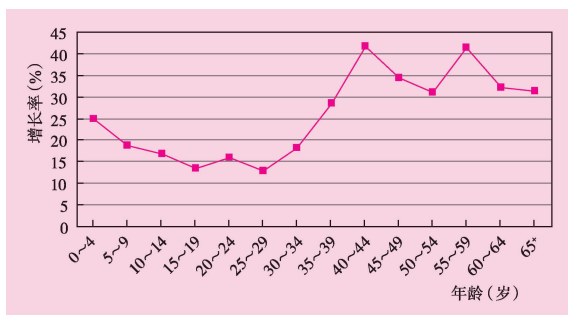


图5 2000~2010年年龄别流动人口规模增长率

多个体层次的数据才能深入分析。

### 三、流动人口的变化

#### (一) 不同年龄对流动人口规模增长的贡献

图5显示了2000~2010年流动人口规模的年龄别增长率,与2000年相比,3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增长率远高于较低年龄组。与低龄组相比,他们对流动人口规模增长的贡献更大。根据以往的年龄别迁移模式,这些较高年龄组的人应当大部分是年轻时外出并长期保持这种流动状态的,所以这10年<sup>①</sup>中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不仅是由于近期离开户籍地流动的人数增加,还是历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定居积累的结果。根据“六普”数据,2010

年离开户口登记地0.5~1年和1~2年的流动人口分别占20.8%和21.0%;而离开户口登记地6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23.8%。居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中有24.0%离开户口登记地6年以上,作为主要人口流入地的上海和北京市的相应比例更分别高达32.2%和30.3%,天津和广东的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0.5~2年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44.9%和44.1%,6年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0.9%和22.1%。这部分人已成为较为稳定的当地居民,只是在身份上仍然是“外地人”。

如果说40岁以上的长期在外的人是比较成功地在城市中工作和居住的一部分当年的流动人口,在20多年来的流动人口中,他们可能是一个具有较高选择性的群体,那些不怎么成功或对生活不那么满意、或者已达到一定的经济收入的农民工已陆续返乡。然而,新一代流动人口则可能有不同的选择。根据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的资料,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中30岁以下的青年有较高比例“想方设法在城市里寻求发展”,而且因“家里需要钱”出来打工的比例远低于30岁以上的流动人口,有更高比例是想“见世面”或“增强技能”才外出打工。可以预见,青年一代流动人口不会像其父辈那样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而很大一部分人会居留城市中寻找工作和发展机会。

与2000年相比,2010年显然有更多儿童随父母跨省流动,这个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家

<sup>①</sup>事实上,诸多有关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有不少流动人口已经在流入地居住了10年或更长时间,但由于六普用分类方式记录离开户籍地时间,而不是实际年数,无法真实反映这一状况。

庭迁移流动的风险降低、条件有所改善,也反映了各地近年来在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问题方面的努力。同时,为了孩子在城里上学,也逐渐成为长期在非户籍地居留的一个主要原因。

### (二) 青年流动人口性别结构趋于平衡

观察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并与2000年和2005年的流动人口性别结构比较,可以发现2010年15~30岁的流动人口男女构成相对平衡(见图6),女性流动人口在较低年龄段的迁移特征逐渐呈现出与男性相似的规律。这不同于2005年以前流动女性15~24岁年龄组的规模明显大于男性的情况,以往那种女性(主要是农村女青年)早于男性外出打工的模式正在改变,流动人口在青年阶段的性别结构更趋于平衡。

### (三) 外出时间的变化

跨省流动的年龄模式具有明显的变化。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是迁移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的乡城迁移者,也是大多数有关流动人口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尽管相隔5年,但2005年和2010年的跨省迁移模式明显的不同,从迁移率反映出的变化在15~24岁最为显著,男女在迁移率上升阶段的差距显著缩小,除了峰值不同外,几乎没有差别(见图7)。差距缩小的直接原因是女性推迟了外出时间,而男性在外出时间上略有前移。如果说,人口流动和人力资本提升应当是相互促进的话,我们在女青年流动模式变化中看到了这种促进的倾向,但男青年的流动模式变化却暗含着相反的作用。

初步分析引起这两种变化的原因,对女性而言,多种因素促进了她们在校时间的延长:

(1)高中和职高毕业有可能找到收入更高、工作条件更好或更有发展空间的工作,因而促进了更多女青年上高中或完成职高后再外出就业;(2)生育率下降后出生的这代人普遍具有家里兄弟姐妹相对较少的特征,且近10年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普及有明显的进展,因而过去农村所常见的在家庭资源匮乏时挤压女孩受教育机会的现象已经少见,这一代人的父母与老一辈相比,也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更好的经济状况,因此家庭有条件为女儿的教育投入更多资源,使她们得以完成愿意完成的学业;(3)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及高中的发展和职业高中的发展,缩小了义务教育阶段和职高教育的性别差距,尤其中学女生在学校中的成绩相对较好,因而有更多的农村女青年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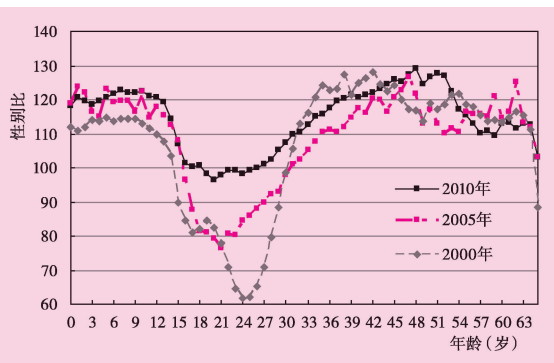


图6 2000~2010年分年龄流动人口性别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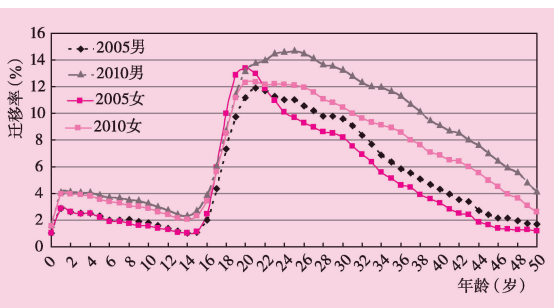


图7 2005~2010年分年龄性别跨省迁移率的比较

以完成更高学业；(4)虽然还有少数女性在20岁以前因结婚而流动，但随着初婚年龄的推迟，多数因婚姻嫁娶发生流动的妇女也推迟了她们的流动时间。

对男性而言，随着近年来非熟练劳动者工资的快速上涨，教育的相对回报率下降，他们看到不必等待大学毕业就可以有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加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有些地区出现“读书无用”的苗头，一些初中生中断了学业或不再升学，提前加入了流动的行列。2006年以前观察到的女初中生更有可能辍学的问题(牛建林,2012)在一些地区已经发生了变化，一项2009~2010年在山西和陕西欠发达地区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男生更有可能因为学习成绩差和家庭条件不好而辍学(Yi等,2011)。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劳动市场变化时，教育也应当有相应的调整和应对措施，通过降低在校学习的机会成本，鼓励学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甚至12年教育，以保证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持续和普遍得到提升。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研究使用的仅限于全国人口汇总数据，无法进一步细分，有可能女青年的推迟外出和男青年的提前外出并非发生在同一地区。鉴于中国的各种变化和人口流动的区域差距明显，进一步的分省或更小行政区划的分析，会更有助于瞄准问题所在。

比较2005年和2010年的迁移率年龄别模式差距，还可以看到2010年在较高年龄组的男女都有更高比例维持在流动状态，显示了相当一部分迁移者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趋势。这一特征与其他相关研究和调查结果一致(段成荣等,2009;杜鹏、张航空,2011)。与此同时，女性流动人口仍相对于男性较早结束流动返乡，因而形成了男女在20岁之后的迁移率上的差距。而在50岁以上的年龄段，大部分流动人口退出流动者行列，反映了在城市工作、回农村养老的模式依旧。

#### (四) 女性因务工经商流动比例上升

对于女性来说，在不同流动原因中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是务工经商和婚姻嫁娶，前者代表了流动女性对经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后者仍为传统的嫁夫随夫行为。改革开放以来，以婚姻嫁娶为主的女性流动逐渐让位于务工经商的流动，近年来的变化幅度尤其显著。表3列出了这两种主要迁移原因的女性流动人口比例，其中因务工经商流动的妇女比例在2000~2010年间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因婚姻嫁娶流动的比例则大幅度下降。这一变化说明女性在经济活动方面的自主性进一步得到提升。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将近一半的妇女认为她们在外出学习或工作方面可以完全自主，青年人中可以完全做主的比例更高。

#### (五) 教育结构的改善和职业结构变化

表3 2000~2010年女性流动人口的主要迁移原因 %

迁移原因	省内			跨省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务工经商	14.5	22.8	25.9	59.9	67.0	69.7
婚姻嫁娶	24.0	16.7	9.9	10.4	7.2	5.0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随着老一代农民工的退出和年轻一代的加入，跨省流动人口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显著增加(见表4)，

小学及以下的比例大幅度降低。流动人口教育结构的变化与全国青年总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是一致的,随着职业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日益普遍,青年人当中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可能还会逐渐提升,未来流动人口的教育结构将进一步得到改善。而在省内流动人口中初中比例上升、高中比例降低,则是值得深入分析的现象。

流动人口在就业构成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事农业的流动人口比例显著下降,跨省流动人口从事生产运输的比例下降了 5.3 个百分点,而商业服务业从业比例显著上升(见表 5)。流动人口职业结构的变化,与诸多外部因素的变化相关,如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市场变化、不同职业的工资增长幅度等,也与流动

人口的结构变化和新生代流动者的择业行为相关。此外,根据笔者对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的流动人口资料分析,发现就业身份为雇员的集中在 25 岁以下,而作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就业的则集中在 30 多岁和 40 多岁阶段(郑真真,2008),间接反映了流动人口在职业流动方面的变化,随着在流入地的经历、技能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积累,以及更多流动人口与家庭成员一起在流入地居住,在流入地工作生活时间较长的流动人口将会有更多人转变就业方式。也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的自营劳动者或个体劳动者往往在流入地居留时间比较长,更有可能与配偶和子女一起在流入地居住,具有这一特征的流动人口往往有更为明显的定居倾向。

#### 四、小结与讨论

通过分析“六普”资料并与此前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到流动人口的结构在某些方面已经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归纳为:(1)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新加入人口流动的青年和在流入地“定居”的中年人都导致了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大;更多 40 岁以上的流动者依然保持流动状态,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已经离开户籍地 6 年以上,这部分人将对流动人口规模增长有更大贡献。(2)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 20~24 岁。以往 15~24 岁年龄组的女性规模显著大于男性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流动人口在青年阶段的性别结构更趋平衡。(3)与此前的年龄别流动模式相比,在十几岁的年轻人中,女青年显然推迟了外出时间,而男青年的外出时间则提前了,以往农村女性早于男性外出打工的模式已经改变;从务工经商原因流动的年龄模式看,女性与男性几乎同时加入流动者的行列,所不同的是女性比

表 4 2000~2010 年流动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化

受教育程度	省内流动	跨省流动
小学及以下	-2.5	-6.4
初中	5.2	1.8
高中	-3.7	2.5
大专及以上	1.0	2.2

注:差距为百分点。

表 5 2000~2010 年流动人口职业结构变化

职业	省内流动	跨省流动
企事业负责人	0.0	1.1
专业技术人员	-1.0	1.8
办事人员	0.2	1.3
商业服务业	10.3	7.9
农林牧渔水利业	-10.6	-6.8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	1.0	-5.3
其他从业人员	0.0	0.0

注:同表 4。



男性早两年退出这个行列。(4)因务工经商流动的妇女比例在2000~2010年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说明更多妇女主动参与经济活动发生流动。(5)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尤其是跨省流动人口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比例提高幅度最大;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男性差距缩小。(6)与2000年相比,目前流动人口非农就业显著提高,从事商业服务业比例增加幅度最大。

流动人口结构的种种变化与21世纪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同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变及教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例如,个别年龄段人口规模的波动,义务教育的普及、高中职业教育和大专教育的发展,中西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对劳动力技能要求的提升,沿海地区持续多年的用工短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镇流入地的长期定居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六普”数据所反映出的变化。本文只是初步描述了这些变化,事实上每一种变化及其前因后果都值得进行专项深入分析。

这些变化对目前有关流动人口的政策和体制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流动人口更多的是作为“劳动力”来对待,城市管理者往往忽视他们的基本权利,如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问题,稳定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家庭需求尤其是子女教育需求问题等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当前流动人口除了规模上数量巨大,他们也和10年前的流动人口有很大差别,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并没有再回到农村,而是在城市中长期居留,他们的下一代在城市中长大、工作,返回农村的可能性更小;青年一代“农民工”已经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在就业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直接从学校毕业后就“进城”,从未务农,“农民工”的称呼对他们已不再适用。这些希望并能够在城市中长期就业和生活的人,应当被视为城市的“新市民”,而不是“流动人口”。然而,在解决问题和应对变化方面,各主要流入地城市显然严重滞后。虽然不少讨论聚焦于户籍制度改革,但实际上户籍并不是唯一的制度约束,国际经验和国内一些尝试说明,除了户籍制度改革外,城市管理者还可以大有作为。

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看,不同人口流动阶段和发展阶段、对于不同的流动者而言,流动经历可能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如从“六普”初步分析结果和其他相关调查研究发现,外出务工有可能对青年完成义务教育和获得更高学历有负面作用,其长期后果将影响到中国人力资源的质量提升,如果各地和相关部门(如教育、就业等)能够采取措施、及时有效干预,将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弱化消极作用,使迁移流动对发展<sup>①</sup>真正起到促进作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11年城镇居民规模有史以来超过农村人口,尽管由于这种超出预期的增长速度引起了对数据可靠性的讨论,但朱宇(2012)通过分析国内外的城乡划分原则和标准,认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长期居住已被各种调查和人口普查所证实,不可否定统计数据所反映的事实,即中国已经有半数以上人口聚居于城镇、且拥有国际公认

<sup>①</sup> 此处的“发展”应同时具有国家和社会发展与家庭和个体发展的不同层次意义,在政策制定和完善方面还需要更多考虑家庭和个体发展。

的城镇人口基本特征。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长期存在流动人口未能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当不少大城市在纷纷制定“小康”目标和时间表时,更需要考虑到这些在城市中的流动人口也是未来小康社会的一部分。

在宏观层面和长远历史时期看,人口的流动是永恒的,稳定是相对和暂时的。中国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人口的迁移流动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与以前限制迁移流动的情况相比,显然更有利于个体和家庭的经济收入增加和个人事业发展,尤其为有条件和有能力的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迁移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来审视,流动本身不一定必然促进发展,流动的成果和积极影响也需要有利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加以维护和扩展。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中国仍有 1/6 的“流动人口”,如此高比例的人口长期处在不稳定状态,致使两代人甚至三代人无法“安居”,更谈不上“乐业”。如果中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使大部分“流动”的人和家庭有一个稳定、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就谈不上和谐与小康的社会建设。

#### 参考文献:

1. 杜鹏、张航空(2011):《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实证研究》,《人口学刊》,第4期。
2. 段成荣等(200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人口研究》,第6期。
3. 段成荣等(2009):《中国女性流动人口状况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4期。
4.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11):《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第6期。
5.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2):《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6. 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7.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2):《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8. 贺雪峰等(2010):《农民工返乡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9. 牛建林(2012):《农村地区外出务工潮对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10. 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2011):《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载于蔡昉主编:《“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 郑真真(2008):《在流动中求发展》,载于谭琳主编:《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 朱宇(2012):《51.27%的城镇化率是否高估了中国城镇化水平:国际背景下的思考》,《人口研究》,第2期。
13. Hongmei Yi, Linxiu Zhang, Renfu Luo, et al(2011), Dropping Out: Why are Students Leaving Junior High in China's Poor Rural Are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doi: 10.1016/j.ijedudev.2011.09.002.

(责任编辑:李玉柱)